

湘江头条

笔者按

2026年6月,笔者陪老师登衡山,山中随处可见的摩崖石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老师是石刻研究专家,他提示我可以写一篇关于衡山抗战石刻的文章,从一个侧面揭示衡山石刻的价值。但因行色匆匆,无法遍览原刻,查询获知2024年南岳区档案馆曾编有《南岳衡山摩崖石刻精粹集》(以下简称《精粹集》),惜未公开出版。冒昧致电,喜得南岳区档案馆大力支持,见示原书,本文方能进入写作阶段。石刻释文除特别说明外,均依据《精粹集》,特致谢忱。

只有向前！ ——抗战时期的南岳衡山石刻

侯承相



“只有前进”石刻。

南岳区档案馆供图

衡山摩崖石刻现存429处,2013年整体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据《南岳衡山摩崖石刻精粹集》刊载,其中明确可刻于抗日战争时期(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)者共21处,时间贯穿14年抗战。

这21处石刻不过全山石刻的二十分之一,但却是抗战烽火岁月最直接的记录。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,南岳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一度成为全国抗战大本营活动的场所:1938年11月后,国民党当局在正面战场框架下于南岳召开多次军事会议;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,在中共中央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,国共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,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任副教育长,周恩来任国际问题讲师,培养抗日游击干部3000余名。

寿岳巍巍而无言,今吾试言之,以见中国人威武不屈之精神。

雍容大雅 忧时之刻

1937年6月18日至22日,邹鲁在“小住黄山”“顺游九华匡庐”后登上了南岳衡山,并题“雍容大雅”四字于高台寺,跋云:“今春小住黄山,顷漫游九华、匡庐而至南岳,觉峻奇秀美,诸山各有大观,而雍容大雅惟南岳足以当之。”从中可见其对南岳情有独钟。

《小住黄山归途顺游九华匡庐而至南岳之作》是七绝组诗,赞美南岳山势雄奇、景色壮阔:“炎方雄长推南岳,令我来游倦眼舒”“雄奇怪险见诸山,儒雅雍容让此间”,表彰南岳撑起南天、挺立神州:“一自宋南他岳失,巍然火德炳神州”,抒发个人情志、欲效仿古人归隐山林“我是生平慕邨侯,功成潇洒返山丘”。第六首归结到眼前国事:

岛夷东海事扬波,独立峰头感慨多。
但使国人能一德,豕蛇荐食将奈何。
“岛夷”指日本,“豕蛇荐食”用《左传》“吴为封豕长蛇,以荐食上国”之典,意指日本贪婪荐食之野心。这四句写于“七七事变”爆发的前夜,为南岳抗战石刻的时代写下了第一声忧叹。

1936年秋,祁阳人张伯英题“秀出群峰”于高台寺,跋云“民国二十五年秋偕内子邓智仙游此书作纪念”——携夫人同游,颇具闲情。

这些刻石内容皆流露出祥和平静的状态,尚不见战争的影响,这自然是因为战火尚未烧到湖南这片“桃花源”。

但1934年夏天高台寺僧人空也的一方刻石却给未来留下了一些伏笔。空也在上封寺讲经后以隶书写下“四弘誓愿”:

众生无边誓愿度,烦恼无尽誓愿断。

法门无量誓愿学,佛道无上誓愿成。
佛门四弘誓愿以“众生无边誓愿度”居首,这也为日后南岳佛门的抗战救亡埋下了因缘。

万方多难此登临

“万方多难此登临”,本是杜甫《登楼》诗句。1939年4月,溆浦人武思光将其题于高台寺,落款“民国廿八年四月奔走抗战,便中游此,感而题此陈语”。“陈语”者,老话、旧句也——用杜甫旧句,写当下时局,一语双关。这一方刻石可视为1938年至1940年间南岳石刻的总体基调。

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多次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,南岳一度成为正面战场的临时指挥中心;国共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亦在此开办。军政要员、名流、僧人一时汇聚,山上的题刻也随之骤然密集——1938年至1940年的三年间,题刻多达十余方。

1938年,黄光华、李培基题“大好河山”于高台寺。山河破碎之际,“大好河山”四字,有金石之声。同年,汉阳人余道一题“起止住行”,前后以小字楷书对联“东西两道路,前后一周天”。起止住行,动静有时,行止有节——一个军人的自警,写进了天地四方的对联里。同年五月,衡山人周安汉题“观海”,单字80厘米×50厘米,篆书,这在以楷书为主的摩崖中颇为罕见;落款有八人同游题名,颇见一时之盛。

1938年重九,李烈钧题“机陞荣怀”于福严寺,隶书。“机陞荣怀”语出《尚书》·秦誓:“邦之机陞,曰由一人;邦之荣怀,亦

尚一人之庆。”意为国家的动乱不安,是君王一人的过错所致;国家的繁荣安宁,也是君王一人的善行导致的。国难重阳,题者取经语对文人石,忧邦国之机陞,望邦国之荣怀,典意自明。

1938年8月至10月,抗日名将宋哲元因病在南岳休养,住磨镜台。他为殉国的部下佟麟阁、赵登禹修建“双忠亭”,并亲撰碑铭;又于高台寺题“诚真正平”。此四字是其治军之要:“诚以修身,真以究理,正以处事,平以待人。”

同年,他于麻姑仙境题“卧虎”,落款“戊寅哲元题”,字为全山最大,整体约500厘米×250厘米。

养病中的名将,把一腔心事尽付石头:“诚真正平”是自砺,“卧虎”二字气势沉雄,与“诚真正平”相映成趣。

1939年,李培基在福严寺题七律一首:江河渡房家何为,到此福严且放慵。欲望京华与岱色,更从天柱上芙蓉。

“江河渡房家何为”,山河沦陷,家国何在;“欲望京华与岱色”,则仍寄望于收复。这是21方石刻中唯一的整诗题刻。

1939年夏,“只有前进”四字被题于半山亭至开云亭的山道旁崖壁。原石下款不见,《精粹集》著录“作者张亦颇”,其人无可考。此方石刻过去少被收录,一因崖壁为厚苔藓覆盖,路过游人极易错过;二因它仅有干支年款,没有撰书人名款,属无款摩崖。

然而,“只有前进”四字,掷地有声,振聋发聩,无疑代表了当时所有中国人对于抗战的态度。一方无名的石刻,恰是无数无名者的心声!5年后发生在衡山脚下的

衡阳保卫战以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、双方伤亡士兵最多、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之名被写入史册,“只有前进”的精神被完整地诠释在了这场战役中,向全世界宣告“若要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”。

1940年夏,赖贵山题“舞狮”于狮子岩,萧星然作跋。题款云:“庚辰初夏,余因游衡岳,见此狮岩雄壮屹立,玲珑生动,故名曰舞狮。吾国七七抗战愈战愈强,外人视我国如睡狮之说,不足信矣。”

晚清以来,西人每以“睡狮”喻中国。赖贵山以“舞狮”对“睡狮”,赋山石以必胜的信念,直接把抗战写进题跋。

同年秋,平江吴楚撰文、湘阴柳敏泉书丹,于黄庭观题“飞仙石”,联语“飞过烟云凝化石,仙参星斗尚留坛”,下款“魏夫人礼斗坛即此,民国廿九年秋”。黄庭观祀晋代魏华存(世称南岳夫人),为道教圣地。战时的香火与文脉,于此延续。

这三年间,山上的僧人亦未置身事外。1938年,祝圣、福严、南台、大善、上封五大寺院联合组织佛教僧侣救护队,道安法师任队长,智圆法师任副队长,参加者一百二十余人,每遇空袭即携担架救护。1939年5月,南岳佛教救难协会正式成立,四年前题刻“众生无边誓愿度”的空也法师任副会长,巨赞、宝生法师等带领僧道参加救护与宣传,发表宣言号召僧徒共赴国难。1939年,周恩来在南岳接见上封寺演文和尚,题赠“上马杀贼,下马学佛”以相励。这一题词经中共统战工作推动,在僧俗中广为传阅,成为南岳佛教救难协会的精神旗帜,巨赞、宝生等以此自勉,积极投入救护与宣传。

重见天日

“重见天日”四字,题于抗战胜利之后,下款“抗战胜利智圆书刊”,作者正是上文那位智圆法师。据田彦《抗日烽火中四位佛教高僧的传奇事迹》一文介绍,智圆法师为拒绝日军招抚劝诱,躲入南岳深山之中,“结茅深壑,茹草嚼雪”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,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。9月3日为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。

智圆法师回到上封寺,在寺下开云亭侧的石壁上镌刻“重见天日”四个大字,款署“抗战胜利智圆书刊”,每字约45厘米×40厘米,楷书横刻。这四个字,笔画平正厚实,少剑拔弩张的气势。出自僧人之手,笔意朴实端重,不以书家技巧见长,重在寄托劫后复兴的心境。八年离乱,一朝光复,一位茹草嚼雪、誓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老僧,把对国家、民族扬眉吐气的万千心绪,凝成这四字刻上石壁——这是21方石刻中时间最晚的一方,也是全部抗战石刻的收束。

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贬谪途中经过湖南,现场阅读永州浯溪摩崖石刻《大唐中兴颂》后写下“平生半世看墨本,摩挲石刻鬓成丝”,今天的我们阅读南岳抗战石刻既是欣赏文物古迹,更是不忘来路。石头无言,而兴亡有声;山河依旧,幸字迹犹存。百世之下,抚此石者,亦当闻昔年金戈铁马之声。

(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)



青年时期的周有光。

资料图片

1945年,抗战胜利前夕,很少赋诗的语言学家周有光,写了一首白话诗,他给其取名为《失落了的欢欣》,副标题是“1945年,抗战胜利在望,重庆”。诗中有这样两段:

当我游乐在吴淞江滨,
——那时我正青春
跳跃的海波戏弄着
飞舞的鸥群。
……

今天,我踟躅在重庆的街心,
——八年了,我追踪着战争——
崎岖的山坡颠簸着
倔强的车轮。

这两段诗句,概括了周有光在抗战前与抗战中的两段不同生活经历,即抗战前在上海的岁月静好,与抗战中在重庆等地的颠沛流离。而在这两段生活经历之间,对于周有光而言,最重要的人生驿站,则是长沙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日寇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,华北沦陷,上海岌岌可危。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

的周有光,决定离开上海,迁往四川。他携家人一路向西,辗转于苏州、芜湖、合肥、汉口,加入了内迁的洪流。

在汉口,周有光偶遇原在中国银行上海总行工作的老友,对方马上就要调长沙分行任经理,他告知周有光,长沙有一份由中国银行等支持的进步报纸叫《力报》,亟需主笔,需要人撰写社论、指引抗战方向。

“不是军人,何以报国?”周有光当即决定,将家人送上赴重庆的船只,自己则奔赴长沙,以笔为枪,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中。

周有光到长沙时,《力报》刚刚创刊。因此,条件十分简陋,跟上海的大报馆,不可同日而语。周有光在晚年的回忆录中,记述了初到《力报》社的情形:

《力报》这个报馆,小得不得了。编辑室是一间大的屋子,里面放了一个帆布小床,给两位主要编辑睡觉用的。我睡一张,另一个编辑睡另一张。其他人都是工作完了,回家睡觉。

尽管《力报》的报馆不大,但其报纸在当时的长沙,却颇具影响力。抗战初期,许多文化人汇聚长沙,《力报》以其鲜明的抗日主张,不仅团结了文化界的抗战力量,而且还与《大众报》《抗战日报》《观察日报》和《前进》杂志等一起,在彼时的长沙掀起了抗战文化的热潮。

周有光在《力报》的工作,就是每日撰写一两千字社论,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:唤醒同胞,坚定抗战。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强调“抗战是艰苦的、长期的,但是有希望的”,既揭露日寇侵略野心,也驳斥悲观投降论调,为迷茫中的中国民众注入信心。为了写好这些社论,周有光广泛收集各方信息,同时融合自己的理性分析与家国情怀,铸成一篇篇铿锵有力、通俗易懂的文字,发挥投笔之力,同时也为更多人点燃了希望。

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原名周耀平的周有光,正式启用“有光”为笔名,寓意“以文传光,照亮前路”。这个名字,伴随着周有光此后人生,也使其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彼此的长沙,作为全国文化人内迁的重要聚集地,满城都涌动着救亡图存的热血激情。但也因此而变得拥挤不堪,住房极度紧张。初到长沙的周有光,只能睡在报社编辑室的帆布床上,以报社为家,日夜伏案。后幸得中国银行长沙分行那位经理朋友的帮助,他才搬进紫荆街的青年会(今五一广场西北角万代大酒店一带),总算在长沙有了安身之处。

青年会自己用风车发电,自己打井用电取自自来水,这些现代化措施,令周有光颇为惊诧,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与工作条件。以前住报馆时,电灯昏暗,如同鬼火,周有光必须再点盏油灯,才能看清稿子。如今到了青年会,夜晚灯火通明,周有光终于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作了。所以,他更加投入,更有激情了,激昂文字,层见叠出。

周有光在长沙,还有一个印象极为深刻,那就是关于长沙的市井生活,具体而言就是长沙人的吃。有一次,周有光受朋友之邀,曾到一个名叫“李合盛”的清真餐馆吃饭。席间,他不仅被餐馆里的餐具,即大桌子、大盘子和长筷子等所深深震撼,更为餐馆老板给所有荤菜取素菜之名而惊奇不已,不禁感慨:“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,但表现出长沙的文化传统,把荤用素菜的名字来表示,这本身是一件很文艺、很有文化的事情。”

基于文人的敏感,周有光从长沙人的日常生活中,深刻地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现代节奏与人文底色。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‘李合盛’给我的印象是中国的传统文化,而青年会给我的是西洋的新文化。”

1938年,由于战火日益逼近,周有光不得不离开长沙,转赴重庆、成都等地。他虽然在长沙待的时间不长,但这段烽火情缘,却从未被遗忘。晚年的周有光,在接待一位长沙访客时,曾直言:“长沙好,抗战的时候我去过。”这短短11个字,包含了他对这座历史名城的深切认可与难忘记忆。

周有光在长沙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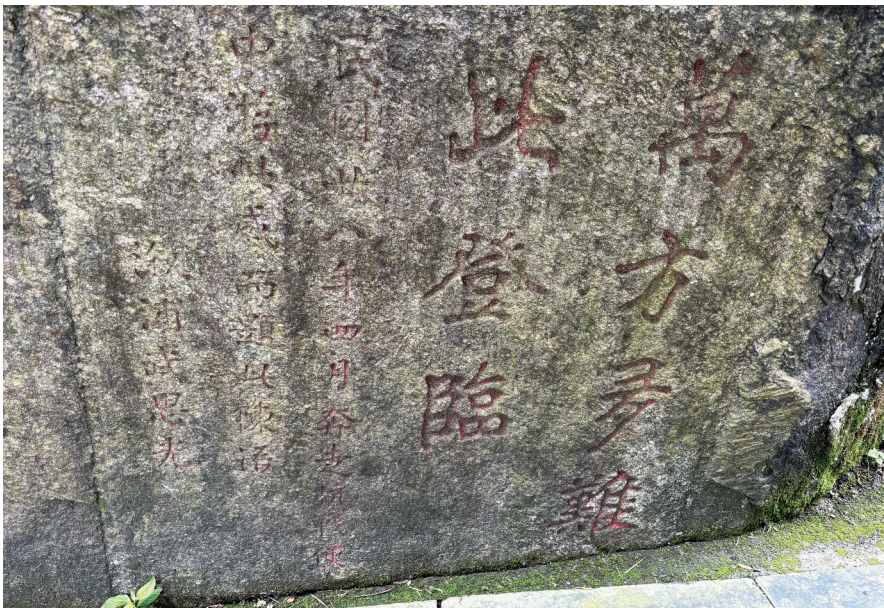
崎岖的山坡颠簸着倔强的车轮

杨卫



“诚真正平”石刻。

作者供图



“万方多难此登临”石刻。

作者供图